



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

〔“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四个多月中，理论批判的工作开展不起来。我在 1977 年 2 月提议召开一系列学术讨论会，突破当时存在的障碍。在 1977 年中，不计北京地区的许多讨论会，带有全国性的讨论会在 4 月、6 月和 10 月之交开过三次。这一篇是 6 月 20 日第二次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预备会上讲话的简单摘要。〕

北京若干个单位共同发起举行一系列批判“四人帮”的理论讨论会，是今年 2 月份的事。在 2 月 25 日召开了一次北京地区的讨论会为全国性的讨论会作准备。

四人帮的谬论很多。先批什么？当时讨论的结果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2）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进行批判。（3）“四人帮”在上海插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编写问题。

从 2 月到 6 月中旬，开过的许多小会和 4 月中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都是有成绩的：提出了问题，亮出了观点，讨论时很认真，许多参加者准备了稿子。现在需要进一步深入。

在 3 月间开始组织协作时和 4 月 14 日的会上，我讲了关于进行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这一工作的几个问题。现在仍是这样，这里再作一次归纳：

(1)“四人帮”及其喉舌发表了许多言论，还有许多“私房话”。公开言论更重要，“私房话”也不应忽视，它为公开言论作了注脚，赤裸裸地暴露了本质。他们暂不便公开讲，就在内部讲，然后吹风出来。但绝不能认为只有“四人帮”的“私房话”才是反动的，公开发表的言论，没有什么可批的。应以批公开言论为主，利用他们的“私房话”让大家更清楚了解他们的本意。

(2)“四人帮”有系统的“理论”，也有零星的一两句话。对零星的话也不要忽视，因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四人帮”的言论，逻辑混乱，前后矛盾，说他们有系统的理论，有人认为这是抬高了他们的身份。这么说，有对的地方，但“盗亦有道”，他们有一套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逻辑，并不是完全没有系统，还是要认真地批。

(3)“四人帮”是两面派，这一点要揭露批判。但是他们的反动行动的确是在他们的反动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不要以为他们的行动是反动的，而言论还是对的。

(4)“四人帮”的许多言论至今未受批判，还被一些人认为“没有多大问题”。我们的同志中不少人当时就识破了这些言论的荒谬，但也有人跟着“四人帮”写了些坏文章，

讲了些错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也可以谅解。但是还有少数人跟得特别紧，非常卖力，为“四人帮”的反革命行动制造理论根据，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反动言论都要批判，但斗争矛头一定要始终对准“四人帮”和他们的帮派体系。

(5) 要有破有立。批判中讲道理就是立。一定要重视立。

(6) 对“四人帮”的“理论”要批探批透，搞清它的反动性究竟在哪里，如何为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同时要揭露“四人帮”怎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去制造那些谬论。

(7) 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定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谬论，但一定要打得准。打在要害上。为此，必须材料扎实，逻辑严密，从而必须尽可能充分地作好研究。开展学术讨论，就是为打准——因此才能打狠——作好准备。某一种观点究竟是不是属于“四人帮”的，完全可以和应当自由讨论。

(8) 要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要不作分析，看到一句对自己的论辩有利的就用。在批判中不搞“两个凡是”。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评张春桥的《论全面专政》

[这是我 1977 年 1 月 30 日准备和一位同志合作写的一本书所拟的提纲，这本书后来没有写出来。]

一、张春桥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在必须粉碎国家机器问题上的分歧。

三、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暴力吗？

四、无产阶级专政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五、“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理论”。

六、社会法西斯的《政治经济学》。

七、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四人帮”那里怎样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打击对象？

八、《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九、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外国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和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苏维埃学”在七十年代中国的忠实门徒。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粉碎“四人帮”的国家学说。

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这是 1978 年 8 月我在哈尔滨一次报告会上的讲话摘录]

“四人帮”有一根大棒叫做“批判唯生产力论”。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他们的阶级斗争，而积极去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说谁搞“唯生产力论”。而“唯生产力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表现。于是这个人就挨批。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来的。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产力论”，是苏联的理论著作中开始用起来的。指的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里写的苏汉诺夫的一种观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拒绝进行十月革命。列宁批评苏汉诺夫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道理；迂腐到了极点”。如果有人也用“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来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我们也会像列宁批评苏汉诺夫那样的。

列宁反对苏汉诺夫，主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俄国应该进行革命，“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使俄国“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中国革命也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

有利的条件，而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建设时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批判，说他们是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岂不荒谬！不过，“四人帮”本来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要制造一顶帽子用来整人，别的就不管了。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虽然批评了苏汉诺夫，但是他始终没有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论断。他认为这是个“无可争议的论点”。他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而是苏汉诺夫等人“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批评他们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把这条原理当作口头禅来反对必须进行的革命时，一直坚持这条原理。

苏联学者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评的苏汉诺夫的那种观点，称为“生产力论”，这种命名的方法本来就不那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另起了一个“唯生产力论”就更不恰当了。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我同两位同志一起研究写一部关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书时，研究出一个称呼苏汉诺夫那种观点的办法，即把它叫做“庸俗唯生产力论”，我们的意见是，“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

但是把它庸俗化就不正确了。正像唯物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庸俗唯物论”就不正确一样。我主张以后不要再用“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来称呼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在解放初期，我在《学习》杂志上用过“生产力论”这个名词，那是我从苏联的书里抄下来的。那篇文章没有署我的真名，用的是君麟这个笔名。趁这个机会把这件事也说明一下，并且声明今后我不再使用苏联学者用过的“生产力论”这个名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大家是了解了。但是，“唯生产力论”究竟是一个好的称呼还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却至今不明确，而且在文章中，甚至在重要的文件中，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贬词来使用。去年冬天开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我没有参加，但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当作一个错误的观点时，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由于我提了这个意见，几个领导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把上面说的那些意见讲了一番，而且还说了这样一些话：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作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建议

[这是 1977 年 7 月写的一篇文章的简单摘要，它表明我倡导建立这个重要的新学科的本意。现在这个学科有很多人在研究，而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也已经有十多年历史了。]

(一)

十五年前，我曾在好几个场合讲过几次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意见。我请苏星同志记下我讲话的要点。我自己又写了些手稿，它们在文革中散失了。在粉碎“四人帮”后，客观的需要，使我感到有写这个建议的必要。

我设想的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它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是一门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理论经济学。我认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可以分做以生产关系为对象、联系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和以生产力为对象、联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经济学。两者都有很大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理论范畴，各有自己的规律。两者合在一起便是研究生产方式的理论经济学了。

五十年代苏联雅罗申柯等人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的阶

段，在经济科学中有研究生产力的学问，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学。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政治经济学，那是错误的。但并不能不要生产力经济学，它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虽然没有用过“生产力经济学”这个名词，也没有说过需要建立这样一门学问，但是在《资本论》中曾详细地探讨过、研究过与生产关系密切联系着的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中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理论，关于社会生产力是由人和生产工具等要素组成的理论，都是马克思本人奠立的，而且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很多比较具体的规律，他也讲到了。

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一学科亟待建立和发展。我愿集中力量去研究它。我认为建立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学，可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更明确，有利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建立和发展。

(二)

在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生产力？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在生产中起怎样的作用？

要看到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从事生产的能力或按照生产的要求引起自然界物质变化所拥有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种能力叫做社会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获得的力量，都是从前的活动的产物”是“过去世纪的产物”是“人类的实践能力的成果”（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与构成生产

的要素不同。生产力是由人和生产工具（即劳动资料）两要素构成的，不包括劳动对象在内。正如构成战斗力的要素与构成战斗的要素不同。战斗力是由人和武器两个要素构成，不包括战斗对象（即敌人）本身在内。在战斗中一定要把战斗对象包括在内。在生产中也包括劳动对象在内。生产有三要素，生产力就只有两要素。我是生产力两要素论者。

明确了这两要素就可以对这两要素分别地进行考察和研究，一步一步地具体化，而且要在它们之间结合的问题上，在运用这社会生产力去同劳动对象发生关系的问题上深入地去研究，要在这种研究中形成一整套概念范畴，要研究社会生产力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要联系社会生产关系去进行这种研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用社会上层建筑去进行这种研究。



一定要把这次规划工作做好

[1977 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制定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这项工作分工由我来抓。1978、1979 我在许多会议上讲了话，那些讲话收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社会科学研究》（正、续两卷）中。这是 1978 年 6 月 3 日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的一部分内容。]

1956 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全国的全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它是与科学技术规划同时制定的。我参加了这两个规划的工作。规划完成后，两个规划由同一个机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实施。1958 年这个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就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负责实施。就学部的地位来说，尽管有国务院的授权，实施起来也是有困难的。以后更由于种种原因，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实施情况很差。

去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提出要制定新的全国全面哲学社会科学长期规划，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写进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规划的期限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相应，定为从 1978 年至 1985 年八年。现在这个规划正处在制定过程中。在北京已召开过一系列的会，各学科规划有的已经修改过好几次了。

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学科规划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认为是成熟的。因为即便是规划，要拿出一个有水平的东西，也要有比较好的研究工作的基础。前一个时期，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被“四人帮”破坏得不成样子。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大家满意的规划，我看是不可能的。看来只能要求利用制定规划的机会，做好这个工作，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在全国范围内来一次全面的推动。就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还是要花很大的气力。我希望大家用今明两年时间集中精力抓一下这个工作。我想这样做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我国现在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要在这方面取得顺利的进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不掌握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开展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祖国的建设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而且这也是中国人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尽的一项义务。当前就一定要积极进行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工作，把这次规划工作做好。

运用思想手段搞学科规划

[这是 1978 年 9 月 27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预备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制定规划时，我们对学科暂作这样的划分：（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哲学（暂时包括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自然辩证法），（3）经济学，（4）政治学，（5）军事学，（6）法学，（7）教育学，（8）历史学（包括世界历史研究），（9）民族学，（10）宗教学，（11）文学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12）艺术学（包括外国艺术研究），（13）科学学，（14）语言学（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外国语言研究、文字学）（15）民俗学，（16）考古学，（17）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研究（包括人口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犯罪问题、环境问题等等），（18）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研究，（19）新闻学，（20）档案学，（21）图书馆学，（22）博物馆学，……，肯定有遗漏的，可以补充。

以上所有学科，都要分别制订发展规划。现在世界上还出现了或分化出一些新的独立的学科，学科规划究竟要制定哪些，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要力求完全和赶上时代的发展。

在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个问题，那就是要运用思想的手

段来搞好各学科规划。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是一件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工作。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也是这样。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找到一个好的题目，并且把研究这个题目的道理和研究这个题目的方法确定下来，可以说已经做了一半的工作。在规划中要确定研究什么问题就要从研究本身中来。各学科都要着重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研究基础是提不出来或者说提不准确的。而且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有许多新的问题提出，会有一些老问题的重要性突出出来，要用很大力量去加强研究。在制定规划时要用互相启发的办法，通过思想手段来动员引导人们去重视那些必须优先研究的课题。

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有教训的。在 1956 年制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这件工作中我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我在做这件工作时，就没有很好地抓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是去搞规划，没有强调这项工作的思想性。1958 年周扬指出我的缺点，我是接受的。这次在制定这个规划时，我主张多讨论应该研究的问题，不要用制定经济规划、科技规划的方法来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

成立全国经济学团体 开展经济研究工作

[这是 1978 年 11 月 2 日我在第四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摘要]

关于按劳分配的问题，这次讨论会已经比以前具体化了，比较深入了。但也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看来对这个问题研究要考虑长期化的问题。这样就需要采取组织研究会的方式来进行。这几次学术讨论会就是由原来几个发起单位组织的“合作社”来举办的，这种形式看来是不能适应这种长期的需要了，而且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应该关心的问题很多，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上。我们建议，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可以成立研究会，例如城市工资问题研究会；农村按劳分配问题研究会；等等。这种研究会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组织方式。七八个人自己结合，可以成立研究会；二十人、三十人、五十人、一百人也可以成立研究会。同样一个问题，可以成立几个研究会，就像我们按劳分配讨论会一样，专题深入就是了。城市工资问题研究会，就是专门就工资问题来专题深入。我们希望在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研究会成立起来以后，在一定的時候，召开一些研究会的联席会。比如，可以召开城市工资问题研究会的代表联席会，讨论一

个关于工资理论问题的研究大纲，到底有哪些问题值得讨论，到底分哪些方面，每个问题的关系怎样？然后再去分头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到明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再开一次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跟现在的讨论会有点格调不一样，主要是由各个研究会到会上报告它的研究成果，然后讨论这些成果。他们的成果可以先印出来。参加研究会的人，可以参加这个会；不参加研究会的人，也可以参加这个会，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对问题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更扩充一点、深入一步。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资问题，机关的工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在农村方面的工分问题，大家有了一年的研究，也可以在会上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深入讨论的一个设想。

在这次讨论会期间，我们进行了成立全国经济学会的酝酿工作。大家早就有成立学会这个想法。这是会得到党和政府支持的。自然科学的学会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群众学术团体有个联合会，叫做中国科协。社会科学界还没有全国性的协会。有的省、市已经建立起各种学会，并且也建立起各种学会的联合组织，叫做社联。有的地方还没有建立。在上月举行的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做总结的时候，会议筹备处共同讨论的意见，要各个地方的学会尽快地建立，以便明年在各个省、市学会的基础上，把全国性的学会成立起来，迎接“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和我国建国三十周年大庆。明年各个学科要提供一批较好的研究成果。这么个重要的纪念活动，应该拿出好的成果来。所以，明年要把主要学科的学会都建立起来。

当然，我们建立学会不是为了纪念活动。经济学会是

个大的学会，人数会很多。经济方面的研究也非常重要。所以，经济学会怎样来建立，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想一想。要想出一些好的办法来。总的说，自然科学的群众团体也好，社会科学的群众团体也好，都应该把它组织成真正民主的群众性的科学团体，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过去，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差的，特别是经济学会。在解放初期，我们成立了一个“新”经济学会，这个学会还做了一点工作，编了一点经济史的资料，以后就什么工作也没有做。没有在群众里做过工作，没有出一个杂志，没有开过一次讨论会。因为开头一段，陈伯达是会长，他是不干事情的。在 1957 年鸣放的时候，他突然要我召开一次会议，没有告诉我他有什么想法。我帮他把会议召集起来了，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开的。在会上他突然提出他一定要辞职。结果就辞职了。从这以后，工作也一点没有进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确实可能是原因之一。现在，我们要成立的学会，不应该是一个没有真正内容、没有民主生活、没有群众基础的形式上组织起来的团体，而应当是真正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要按照这种方向来考虑和组织。我们这个学会成立起来，要便于更好地进行学术讨论。关于怎么样组织学会，因为它既然是个民主的团体，就得靠大家来出主意，大家来想办法，集思广益，这样，团体才能组织得好，才能发挥作用。

关于这个团体怎么样成立、怎样组织的问题，大家发表的意见还不多。作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工作者，我也有一些想法，借这个机会说一下，便于大家考虑问题。我的想法是：中国经济学会，它的会员应该主要是团体委员。就是说，各个省、市的经济学会，各种经济学的研究会，各